

程光炜：从“以论带史”转向“论从史出”

年度文学评论

程光炜《小说的读法》

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

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

致敬辞

作为致力于文学历史化、经典化研究的学者，程光炜以史料为基、以思辨为魂，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拓路领航。《小说的读法》汇编十八篇他对当代经典小说的研究文章，独具创见。他将小说叙事与作家的个体命运、时代的滚滚洪流紧密联系，在对自我知识积累及思想经验的回望、反省和探索中，完成了与世界的“深情互见”，为行进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立下一块沉稳的历史界标。

访谈



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谢有顺(左)与广州市荔湾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福政(右)共同为程光炜(中)颁发奖杯、证书

小说家一生的创作就像一条弧线

我和这本书描写的作家大多都是同龄人，在写文章时，我难免不把自己内心世界的某些感受，也揉进文章当中。这是我与这些作家作品产生精神共鸣的地方。不过，我同时是在以旁观者的眼光、心情、角度来分析他们的作品。所以，这本书运用了一些社会学的方法、心理学的方法、历史研究的方法。

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有一个观点，说小说家一生的创作就像一条弧线，从二十多岁起步，三四十岁或者更晚，才写出他的代表作，也就是高峰，然后再缓慢地下降。因此大部分人的晚年作品，不可能再超过他们自己高潮期的作品。我对这个观点深以为然。在我看来，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好的作家和文学作品，即将走向尾声。之后几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，也许会有比他们更出色的年轻作家涌现。

程光炜

1956年12月生，江西婺源人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。著有《当代文学的“历史化”》《文学史二十讲》等。



一种“回到历史现场”的解读

羊城晚报：《小说的读法》一书的选目中，既有作家公认的代表作，如张炜的《古船》，也有非代表作，选篇的标准是什么？

程光炜：《小说的读法》是我个人研究路径的一次转型，是我向文学批评的“告别之作”。当代文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：一是当代文学批评，二是当代文学史研究。在前期研究阶段，我也写了不少批评文章，尤其偏重小说评论。我的评论更像是“史家的批评”，关注的往往是已经进入经典序列的作家和作品，也就是那些经过时间沉淀、被文学史反复验证过的文本，和当下即时的、现场的文学批评不同。

我编选这本书，主要基于两个考虑：一是这些作品大致代表了近四十年来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；二是采取以作家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，通过深入解读我认为最能体现他们风格气质的具体文本，

来呈现作家的整体风貌。

羊城晚报：《小说的读法》分为甲、乙、丙三辑，是按照写作时间划分的吗？

程光炜：这18篇文章，大部分是在2012年至2022年这十年间完成的。我将新时期文学分为两种类型：一类是写世俗生活，如莫言、贾平凹、王安忆等，被归为甲辑；一类是写精神生活，如张炜等，被归为乙辑。丙辑中怎么又加入汪曾祺、蒋子龙等非新时期的作家？汪曾祺属于现代文学的末尾，他启发了王安忆、格非等人的创作；蒋子龙是新时期“改革文学”的发轫者之一。我选择这两位作家，主要想谈新时期文学发端的问题。新时期文学并不简单始于1978年，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汪曾祺、蒋子龙等作家创作的、带有过渡色彩的文学作品。我把他们二位视为新时期文学先期性的两个作家。

将重心转向当代文学史料考证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说《小说的读法》是您向文学评论的“告别之作”？

程光炜：之所以选择写《小说的读法》这样一本书，是因为我心中仍存有一种责任。新时期文学发展四十年来，我既是它的读者，也是它的批评者，同时还是一位讲授当代文学的高校教师。我感到有义务通过一本书，把我这些年做的文学批评工作，以“作家论”的方式留下来。这本书也因此带有总结与告别的双重色彩。最近十几年，我基本不再从事作家论式的文学批评，而将重心转向了当代文学的史料考证。

羊城晚报：您的研究由文学批评向史料考证转型的契机是什么？

程光炜：前二十几年，我指导学生进行当代文学研究，主要采用的是“以论带史”的方法。当代文学的史料相对不足，往往借助既有的概念、范畴或研究对象来展开论述。后来我逐渐意识到，当代文学需要“历史化”。这种“以论带史”的研究方法，批评和论证的色彩较强，却缺乏足够的材料来检验这些

观点。

我想，大学是探索真理的地方，我应当带领学生向未知的领域前进。因此，近十年来，我转向了“论从史出”的研究路径，强调“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”。在我看来，“以论带史”缺乏可持续性，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必须扎实地回到文献基础之上。

羊城晚报：您多年来倡导并实践当代文学的“历史化”，能否谈谈这些年的研究心得？

程光炜：实际上，洪子诚教授是这一路径的开创者，他通过教材示范当代文学也可以“入史”，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奠定了学科史书写的基础。我则写了很多倡导性的专著和文章，如《当代文学的“历史化”》《文学讲稿：“八十年代”作为方法》等。从2005年至2025年，我在人大持续举办“重返八十年代”博士生工作坊，围绕当代文学如何“历史化”展开课堂讨论与专题研究。这一过程既是方法、实验，也伴随着反思与修正，整体上可以视为当代文学走向史学化、学科化的一种持续努力。

“经典”最终要经得起时间淘洗

羊城晚报：如何理解当代小说的“经典化”？

程光炜：当代小说的“经典化”，需要依靠时间来检验。能够成为“经典”的小说，我觉得是综合性的，但往往在某一方面的优势特别突出，比如叙述能力、人性剖析、时代反思等。我在《史料的前途》中提出，我认为最好的作家是“50后”作家。这一代作家已经逐渐沉淀下来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代表作，他们的创作成就也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。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说最好的作

家是“50后”作家？

程光炜：“50后”作家是在大历史、大变革中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人，他们生于患难，长于患难。在大时代里往往能涌现出最杰出、最伟大的作家。当你生活在一个大历史之中，你的历史体验、对社会的观察，注定会比前后时代的人站得更高、看得更深。“50后”作家的作品中浸透着厚重的历史生活，承载着深刻的历史体验。他们把自己一生的经历，其中不乏创伤与忧患，全都写进了作品里。

王占黑：写作欲望涌现时，一切召之即来

年度新锐文学

王占黑《正常接触》

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

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

致敬辞

王占黑的小说集《正常接触》聚焦寻常人生，真实质感与温润光亮交织，于日常的深邃处显影；以方言入文，自带市井肌理与生活温度，叙述克制却直抵人心。她以90后作家的敏锐与勇气，扎根最鲜活的现实土壤，以冷峻视角捕捉日常琐碎中的生命韧性，以细腻笔触刻画非常时期的非常状态，在小人物悲欢里照见时代命题，让平凡故事绽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，成为当下华语文学极具辨识度的新一代作家代表。

访谈



广东省文联党组成员、专职副主席生继锋(左)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专职编委林洁(右)共同为王占黑(中)颁发奖杯、证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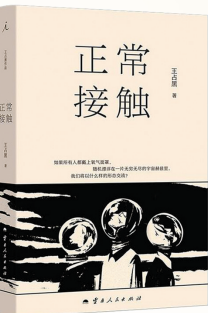
在虚构中再一次共渡

严格来说，我写小说不过十来年的时间，就修行而言，十年是不值一提的，就像金庸小说里的小菜鸟、小徒弟，刚刚习得一些三脚猫功夫。现在我快三十五岁了，能在这里获得一个年度新锐文学得主的肯定，我觉得这正适合自己，是一种鼓励，又不会让我太得意。

从尝试写作起，我就对城市的公共生活充满兴趣，或者说，我关心人如何在家之外的地方开拓领土，关心血缘之外的人际关系之间如何连结。一直写到现在，越觉得这只是个开始，《正常接触》对我来说很特别，也很艰难。感谢每一位读过的人，我们共渡过一段真实的历史，又在虚构中再一次共渡。对我来说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上坡，下坡，回头路，都有可能，但我还会继续这样写下去。

王占黑

1991年9月出生，浙江嘉兴，目前居住在上海，已出版小说集《小花旦》《空响炮》等。



写作就是随心所欲

羊城晚报：在走向写作的道路上有什么重要节点？

王占黑：大多数人的生活经历都不像戏剧，有一个能反复铭记、咀嚼的时间节点。能在花地文学榜获得年度新锐文学得主的肯定，我很高兴。这是一种鼓励，又不会让我太得意。“新锐”这个词对我很有纪念意义。还记得我在写作上得过的第一个奖，那是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夏天，我参加写作比赛，恰巧也是获得了和“新锐”相关的奖项。某种意义上，那也算我写作的起点。

羊城晚报：对你来说写作意味着什么？

王占黑：最开始就是一种冲动，觉得要写点东西的欲望，比现实生活中其他事情都重要。虽然写作过程本身很痛苦，但它能带来的快乐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的。这种冲动并不常有，我是在二十几岁

的某一年才抓住了它，并一直做下来。

其实不用把写作想得多么崇高或者有负担，每个人最开始尝试写作时，都是写作的“小学生”。小学生写作文可以很真诚、很有创造力，这是很美好的事情。我刚开始写的那些东西，其实都在我的记忆和生活中盘踞很久了，到了某一时刻它们自然而然就会流淌出来。对我来说，写作就是随心所欲。

羊城晚报：就读大学的中文专业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？

王占黑：当时中文系老师有个很经典的说法，“中文系不是学写作的”。我上大学之后就没再写小说了，直到读研究生才不知不觉重新开始写作。对我个人而言，写作这件事不是按物理时间线来判断延续性的。时间对我的写作状态来说，并不会形成阻碍，当写作的冲动和欲望涌现时，一切都会召之即来。

最关心“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际关系”

羊城晚报：你会用什么关键词来定位自己的写作？

王占黑：一直以来，我最关心的是“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际关系”。非血缘的羁绊，让我觉得更有书写的欲望，我更在意“公共”维度下人与人的互动。

“公共”对我而言是个分量很重的词，大家日常穿梭的街巷、共享的社区广场等公共空间；一代人共同经历过的、沉淀在生活里的公共记忆；在这些空间和记忆里慢慢生长出来的、不依赖血缘的人际关系，这些都是我一直想在写作里去触碰、去讲述的东西。

如果再找一个关键词，那大概是“城市”。我写的这些关系、这些故事，几乎都扎根在城市的土壤里。

羊城晚报：《正常接触》里的对话都没有冒号、引号，这是特意设

计的吗？

王占黑：这是为了贴合现在的生活状态。现在大家面对面说话的时间很少了，更多是打字、发语音、视频通话。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叙事特征，不用刻意加标点，反而更真实。

羊城晚报：在《正常接触》中，上海、广州、深圳这些城市都出现过，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城市作为写作的背景？

王占黑：广州一直是我很喜欢的地方，尤其适合冬天过来，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，心情会变得轻松，很安心，甚至会忘记自己其实是这个城市的陌生人。

我在上海住了15年，上海变化很快，住久了会有两种感受：有时觉得自由，一个女性在大城市里没太多牵绊；有时又觉得极度的孤独、困惑，这很真实。

时不时让自己离手机远一点

羊城晚报：阅读和经历，哪个对你的写作帮助更大？

王占黑：我会选择多走走看看。不一样的人了解世界的方式不同，有的人能从书、电影、音乐里找到世界，但对我来说，认识和寻找世界的方法就是进入真实的世界，这更重要。

羊城晚报：日常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，有什么特别的习惯？

王占黑：我不是“每天必须写”的类型，唯一的“好习惯”可能就是不熬夜——对有些创作者来说，这个习惯会扼杀他们的灵感。

羊城晚报：作为作家，最重要的素质或能力是什么？

王占黑：我最想分享的就是，一定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，千万不要先去想市场需要什么、读者想看什么。写作是一场漫长的练习，所以如果想写了，就不要犹豫，下笔写起来。

羊城晚报：现在年轻人埋头于手机，很少纸质阅读，你怎么看待这种状态？

王占黑：我很理解，我也一直在跟手机做斗争，时不时要制造障碍，让自己离手机远一点。这不是

年轻人的错，他们出生成长在让人眼花缭乱的数字时代，纸质阅读这种比较古老、需要“吃苦”的方式，很难成为第一选择。

或许我们该认清一点：可能淡出日常的，从来不是“阅读”本身，而是“纸质阅读”这种形式载体。阅读本就不该被局限在单一形式里，它的核心是对外界信息的吸收、对自我认知的补充，是用不同方式让生命更充实。

所以，我想不会因为纸质阅读的式微，而归咎于谁、责怪谁。毕竟，重要的从来不是“用什么读”，而是我们始终保持“想要吸收、想要成长”的意愿。

羊城晚报：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，你写作的动力是什么？

王占黑：写作是一件纯粹、古老、原始的劳动，即便大家都不看书了，我想写的时候还是会去写。写作过程其实很纯粹，在最早最早的时候，没有出版方、读者、市场，只有书写者和文本之间的关联。

我很佩服现在还喜欢写作的年轻人，在那么多诱惑面前，选择了写作这种看起来有点老掉牙的事情，他们太了不起了。